



尼赫魯與梅農

◀ (上接9版)

移居海得拉巴之后,他把房子卖给了一个印度教徒。1889年,莫狄拉尔买下了这里,在他的朋友——乌尔都语诗人阿克巴·伊拉哈巴迪(Akbar Allahabadi)的建议下取名为“阿南德庄园”,伊拉哈巴迪自己的房子叫作以施拉特宅邸(Ishrat Manzil, 极乐庄园),寓意跟“阿南德庄园”一样。莫狄拉尔1900年搬进这座房子时,贾瓦哈拉尔只有十岁。

1923年,莫狄拉尔反叛甘地的抵抗政治,与孟加拉领袖达斯(C. R. Das)共同在国会内创建了斯瓦拉杰党(Swaraj Party,意为“自治党”)。尼赫鲁坚持不愿跟从父亲的领导远离甘地,而莫狄拉尔则被儿子诱导着放弃了亲英派温和政治。

尼赫鲁少年时,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组织的神智学协会(Theosophical Society)在印度变得流行起来,协会建立在佛陀转世的信仰之上。作为当时最睿智的女性,安妮在政治上主张印度本土自治。一个耐人寻味的巧合发生了,尼赫鲁和克里希纳·梅农几乎在同时被接纳入会。梅农是一个来自喀拉拉邦的男孩,在英国求学时加入神智学协会。年轻男孩们被道德上并不总是无眠的“老师们”“推举”为佛陀的转世化身,一位名叫李德彼特(Charles Webster Leadbeater)的老师已经因为性侵这些儿童而臭名昭著,克里希那穆提就是丑闻中最有名的受害者。克里希纳·梅农后来也离开协会,幸存下来,成为了英国左翼圈子里最重要的国会激进分子。

梅农在贾瓦哈拉尔的人生中扮演关键角色。尼赫鲁进入费边社的圈子,跟英国最重要的左翼政治思想家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取得联系,与西蒙委员会和斯塔福·克里普斯建立友谊,将苏联当作与印度共同对抗美国的联盟以及经济发展的模版,与埃德温娜·蒙巴顿发展罗曼史等等事宜,包括1962年以后的逐渐低迷,都与梅农有关。1947年梅农与蒙巴顿一家的亲

密关系对印巴分治的决策也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梅农,甘地原本可以阻止分裂,任命真纳为独立印度的第一个首相。正如梅农帮助尼赫鲁追求埃德温娜,他也是介绍尼赫鲁与蒙巴顿商谈英属印度的政治方向的中间人。

在临时政府阶段,尼赫鲁在内阁与利雅卡特·阿里·汗(Liaquat Ali Khan)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尼赫鲁显然是出于裙带关系要把他的妹妹维贾雅·拉克什米(Vijay Lakshmi)派到莫斯科当大使。沃尔波特认为,尼赫鲁这么做的真正原因是她在德里的一家旅馆继续着与赛义德·侯赛因(Syed Hussain)的情事,因此不得不把她送走,同时任命侯赛因为驻埃及大使。1954年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 1917—1984)抛弃了丈夫费罗兹·甘地(Feroze Gandhi),来到总理府邸开始了学徒期,为未来成为印度领袖作准备。她憎恨父亲与埃德温娜的暧昧关系(埃德温娜在马来半岛读着尼赫鲁的情书死去),因为她憎恨父亲对母亲卡马拉(Kamala)的忽视。

1964年,尼赫鲁去世,还没来得及把社会主义和反美立场作为遗产充分地赠予他的国家和国民。在印度独立前夜,同样也是印巴分治的前夜,在名为《与命运的幽会》(“A Tryst with Destiny”, 1947年8月14日)的著名演讲中,尼赫鲁给他的人民留下了这些话,而这或许也是后分治时代的南亚次大陆需要重新记取的箴言:

我们为获得自由而感到欣悦,尽管乌云仍然布满天空,我们的人民依然感到伤痛,重重困难依然环绕着我们。但是,自由必然带来责任与重担,作为自由而自律的人民,我们必须一起直面这些重负。

(综合编译自Khaled Ahem, “The Genius of Stanley Wolpert”, 《新闻周刊·巴基斯坦版》; Ashis Nandy, “The Last Englishman to Rule India”, 《伦敦书评》; Jawaharlal Nehru, “A Tryst with Destiny”)

把中国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当成研究对象的海外中国学,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了学科概念。研究者、研究对象及读者构成了一个关系脉络。转换关系脉络,就自然而然会形成不同的问题意识,改变研究设计,重订研究方法。

世界各地对中国进行研究的学者,必然面临所有区域研究中都会遭遇的两个挑战:研究者如何界定中国研究的范畴;研究者采取何种理论视角。到了21世纪,中国崛起的叙事不胫而走,因此对中国进行研究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知识社群不可避免的任务,以至于中国研究范畴的界定更加复杂。

如今,纵使所研究的课题只是某个具体的村落、人物、事件、文本、现象、机构、政策,都可以称为中国研究。尽管没有人能武断地否认域外也有中国研究的课题,如华人与祖国的关系,但通常有其他的学科领域容纳了这些课题。其结果,这个本来研究者说不清楚的范畴,就与研究者的俨然区分成主客二元对立的客体。这种自居于研究对象之外的研究位置,造成各地的研究者忽略自己其实并不是身在中国之外的观察者。

至少两股力量在颠覆中国研究中主客二元对立的框架。首先,是在理论上,有的欧美研究社群中的反省力量,不断抵抗主流,并警告研究对象社群,不要轻易接受欧美研究主流预设的范畴。其次,是在实践上,原本属于研究对象社群的学者与属于研究者群体的学者已经交融,他们开始拥有师生、家人、合伙、同事等等关系,导致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两种角色共生的现象。简言之,中国研究、中国研究者与中国研究对象三者相互构成,生活中的他们之间,不再存在疆界明晰的主客对立。

一旦在中国研究这样的议程中,同时作为研究对象与研究者的成为常态,以中国研究具备客观范畴当作前提的这种由外而内的研究视角,难免引发不安。有的反省者乃不断提出异议,戮力证明中国不是既有中国研究中呈现的这样或那样,并充满热情地提出相庭抗礼的研究主张;有的依附者却刻意临摹、复制某种欧美典范,以便证明自己如同脱亚入欧一般,不再属于研究对象的社群,俨然取得了一种欧美主体性,能在中国身份之外,与欧美同仁建立平起平坐的感觉。实践中,多数人可能在这

两种趋向之间摸索徘徊,莫衷一是。

以下,就来追踪这个研究对象与研究者的学习重新相互(或自我)面对的历程,从1)如何从中国作为研究对象的位置,来归纳研究者,到2)如何整理研究者自诩的所谓客观性,最后3)透过一个以“关系”为内涵的知识框架,探究中国研究的各方人物,因为研究中国而取得了什么样的中国性(本文称之为“后中国性”或“后华性”),以便尔后来者追踪他们的学思历程,尤其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共构的、变迁的关系过程。

以“海外中国学”之名所指

把中国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当成研究对象的海外中国学,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了学科概念。如果将“中国学”定义为研究中国专家及其思想与写作的学问,较早的反省毋宁可以被称为一种隐隐约约的“批判的中国学”,也就是以指出海外既有中国研究的错误或偏差为宗旨的研究。国内对于这些错误或偏差的揭示,与读者及作者所处的历史时空息息相关,如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欧洲中心主义、帝国主义等等。

在纠错型中国学之后出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领衔的“海外中国学”,是形成学科领域的雏型,也是改革开放以后跟前来交流调查的研究者多所接触下,具有信息搜罗功能的研究。海外中国学是以外文的中国研究文本为线索,进而追踪研究者与研究机构的中国学。实践上,海外中国学偏重于中国研究机构与研究者的基本资料的建立、历史背景的译介、合作关系的开发及中国形象的整理。既然研究者与中国这个身份范畴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实际上等于已经超越了内外两分的预设。

在海外中国学发展的同时,“世界中国学”的概念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油然而生。相对于海外这样比较宽松的概念,

把海外中国学放进关系脉络

石之瑜

世界中国学以归纳中国学议程上各国研究者之间已经形成的多种共同课题,强调开放性,与时俱进,其间来源包括研究文献与当代事务在内,比如在国际关系方面,有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的软实力、两岸关系等等共同课题,通过有共同研究兴趣的各地学者共聚一堂,集思广益。从空间上讲,世界中国学是对已经有成果的中国研究进行议题的分门别类,从时间上讲,则是一种对正在进行的中国研究的继续招纳。

另一个与海外中国学相对或相称的学科概念是“域外中国学”,虽然看似比海外更广泛,但隐含了特别是对亚洲内陆与中国接壤地区的重视,也就提示了作为中国边疆的诸多地区与民族,在遭遇域外中国研究或域外中国认识的时候,也具有各种值得归纳纪录的回应视角,这点可以从葛兆光发表的《宅兹中国》一书中得到启发。因此,所谓域外中国学可以经过衍生而加以定义,即将之视为是从研究对象的各种回应中重现位于中国范畴之内的多元主体的中国学。

(下转11版) ➔